

二十世纪的记忆丛书——走进大师

从前

CONGQIAN

万人如海一身藏

WANREN RUHAI YISHENGCANG

刘琅 桂苓 编

我和吴祖光的交往已经60年。在我的心里，吴祖光是当代中国文化人当中一个最具独特价值，甚至可以说是——个奇迹般的人物。我指的不是大家公认的他在戏剧创作上的杰出成就，也不是他的修养和文采。我指的是他作为一个文化人，一个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里生活过来，在连续不断地遭受着打击和忍受着屈辱的政治境遇中，居然能以生命的顽强保持着属于他自己的一个文化人的性格、尊严、价值和自由的心灵，这确实是个奇迹。

从前

CONGQIAN

万人如海一身藏

WANREN
RUHAI

YISHENGCANG

刘琅
桂苓
编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前：万人如海一身藏/刘琅，桂苓编.-北京：中国
友谊出版公司，2005.2

ISBN 7-5057-2080-5

I.从... II.①刘... ②桂...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03389号

书名 从前：万人如海一身藏

编者 刘琅 桂苓
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

规格 635×965毫米 16开本
25.75印张 310000字

版次 2005年3月第1版

印次 200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-8000册

书号 ISBN 7-5057-2080-5/I.544

定价 35.00元
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
邮编 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目录



四位先生 / 老舍	1
忆西谛先生 / 吴晗	5
郑振铎先生的“书癖” / 许觉民	9
我与老舍 / 罗常培	12
老舍先生二三事 / 梅林	15
我与老舍与酒 / 台静农	19
打屁股	
——忆老舍 / 端木蕻良	22
怀念老舍先生 / 新风霞	25
花之路	
——纪念妈妈胡絮青 / 舒乙	30
我师夏衍 / 黄宗江	35
忆赵朴初在“文革”岁月中 / 袁鹰	39
走近施蛰存先生 / 徐芳	46
高风千古仰斯人	
——缅怀施蛰存先生 / 刘梦芙	52
他在天国看风景	
——悼卞之琳先生 / 桂苓	57
傅雷二三事 / 刘海粟	60
记傅雷 / 杨绛	72
傅雷：人格永恒的美 / 黄宗英	77
难以走出的雨巷	
——关于戴望舒的辩白书 / 李辉	80
这颗心燃烧了一百年 / 谢冕	92

虽曰未学：怀静农师二三事 / 郑再发	95
清风明月，高山流水	
——我心中的俞平伯先生 / 吴组缃	99
追忆俞平伯先生的治学作文之道	
——为悼念平伯师而作 / 吴小如	102
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 / 叶兆言	107
忆俞平伯 / 黄裳	110
俞平老的“书生气” / 朱寨	119
故人书简	
——怀念叶圣陶 / 黄裳	122
一死一生见交情	
——记沈从文 / 糜华菱	131
沈从文晚年口述 / 王亚蓉	136
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/ 陈徒手	143
怀念丰子恺先生 / 刘海粟	153
父亲雪峰 / 冯夏熊	156
冰心女士访问记 / 子冈	160
高墙内外的胡风与我 / 梅志	168
遥寄张爱玲 / 柯灵	184
“余霞散绮，向烟波路”	
——送柯灵先生远行 / 康金海	191
悼念柯灵 / 曾敏之	194
悼念楼适夷先生 / 舒芜	197
乘风破浪的旅程	
——怀荒煤 / 林非	202
怀念曹靖华先生 / 魏荒弩	206
敲门 / 邓伟	210
守望在人生的边上 / 施亮	214
京城吴家的家风和校风 / 吴徕	227
吴祖光最后的日子	
——女儿吴霜回忆父亲 / 颜菁	232
我心中的吴祖光 / 杜高	237
道别	

——忆父亲萧乾弥留之际 / 萧桐	241
记叶灵凤 / 刘以鬯	248
漫忆汪曾祺 / 邓友梅	255
纪念汪曾祺 / 巫宁坤	262
清谈汪曾祺 / 桂苓	266
音乐人生 / 桂苓	269
短巷情长	
——记父亲臧克家和赵堂子胡同老街坊 们 / 臧小平	273
沈从文与丁玲恩怨沧桑 / 李辉	279
挣扎在男人的世界的丁玲 / 夏逸陶	285
北京城里北京人:收拾残片	
——陪海音先生再走城南 / 傅光明	288
另一段城南旧事 / 余光中	293
怀念罗荪 / 丹晨	297
荷香深处祭灵魂 / 从维熙	302
怀念孙犁先生 / 铁凝	309
看望孙犁先生 / 彭荆风	315
忧郁的孙犁先生 / 肖复兴	319
寂寞也是一种境界 / 罗雪村	323
倏忽人间四月天	
——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 / 梁从诫	326
才女林徽因 / 萧乾	329
怀念林徽因 / 何向阳	331
忆韦君宜 / 许觉民	338
忆徐訏 / 刘以鬯	342
记赵清阁 / 刘以鬯	347
夏志清传奇 / 刘绍铭	351
翻译家草婴其人 / 高莽	355
好人冯牧 / 李子云	364
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 / 严文井	372
梁宗岱和沉樱最后的遗憾 / 佚名	378
孙姨和梅娘 / 史铁生	384

从 前

从 前 万人如海一身藏
CONGQIAN WANREN RUHAI YISHENGANG

复旦名师 / 许道明	388
灵地缅想胡河清 / 刘琅	393
大荒中的苦吟与圣咏 ——纪念昌耀先生 / 沈葦	396
暮春时节的雷雨 / 王晓明	400
诗人之死 / 耿立	403

四位先生

老舍

吴组缃先生的猪

从青木关到歌乐山一带，在我所认识的文友中要算吴组缃先生最为阔绰。他养着一口小花猪。据说，这小动物的身价，值六百元。

每次我去访组缃先生，必附带的向小花猪致敬，因为我与组缃先生核计过了：假若他与我共同登广告卖身，大概也不会有人，出六百元来买！有一天，我又到吴宅去。给小江——组缃先生的少爷——买了几个比醋还酸的桃子。拿着点东西，好搭讪着骗顿饭吃，否则就大不好意思了。一进门，我看见吴太太的脸比晚日还红。我心里一想，便想到了小花猪。假若小花猪丢了，或是出了别的毛病，组缃先生的阔绰便马上不存在了！一打听，果然是为了小花猪：它已绝食一天了。我很着急，急中生智，主张给它点奎宁吃，恐怕是打摆子。大家都不赞同我的主张。我又建议把它抱到床上盖上被子睡一觉，出点汗也许就好了；焉知道不是感冒呢？这年月的猪比人还娇贵呀！大家还是不赞成。后来，把猪医生请来了。我颇兴奋，要看看猪怎么吃药。猪医生把一些草药包在竹筒的大厚皮儿里，使小花猪横衔着，两头向后束在脖子上：这样，药味与药汁便慢慢走入里边去。把药包儿束好，小花猪的口中好像生了两个翅膀，倒并不难看。

虽然吴宅有此骚动，我还是在那里吃了午饭——自然稍微的有点不得劲儿！过了两天，我又去看小花猪——这回是专程探病，绝不为了看别人；我知道现在猪的价值有多大——小花猪口中已无那个药包，而且也吃点东西了。大家都很高兴，我就又就棍打腿的骗了顿饭吃，并且提出声明：到冬天，得分给我几斤腊肉；组缃先生与太太没加任何考虑便答应了。吴太太说：“几斤？十斤也行！想想看，那天它要是一病不起……”大家听罢，都出了冷汗！

马宗融先生的时间观念

马宗融先生的表大概是(我想是)一个装饰品。无论约他开会,还是吃饭,他总迟到一个多钟头,他的表并不慢。

来重庆,他多半是住在白象街的作家书屋。有的说也罢,没的说也罢,他总要谈到夜里两三点钟。假若不是别人都困得不出了一声了,他还想不起上床去。有人陪着他谈,他能一直坐到第二天夜里两点钟。表、月亮、太阳,都不能引起他注意到时间。

比如说吧,下午三点他须到观音岩去开会,到两点半他还毫无动静。“宗融兄,不是三点有会吗?该走了吧?”有人这样提醒他。他马上去戴上帽子,提起那有茶碗口粗的木棒,向外走。“七点吃饭。早回来呀!”大家告诉他。他回答声“一定回来”,便匆匆地走出去。

到三点的时候,你若出去,你会看见马宗融先生在门口与一位老太婆,或是两个小学生,谈话儿呢!即使不是这样,他在五点以前也不会走到观音岩。路上每遇到一位熟人,便要谈,至少有十分钟的话。若遇上打架吵嘴的,他得过去解劝,或许把别人劝开,而他与另一位劝架的打起来!遇上某处起火,他得帮着去救。有人追赶扒手,他必然得加入,非捉到不可。看见某种新东西,他得过去问问价钱,不管买与不买。看到戏报子,马上他去借电话,问还有票没有……这样,他从白象街到观音岩,可以走一天,幸而他记得开会那件事,所以只走两三个钟头,到了开会的地方,即使大家已经散了会,他也得坐两点钟,他跟谁都谈得来,都谈得有趣,很亲切,很细腻。有人刚买一条绳子,他马上拿过来练习跳绳——五十岁了啊!七点,他想起来回白象街吃饭,归路上,又照样的劝架,救人,追贼,问物价,打电话……至早,他在八点半左右走到目的地。满头大汗,三步当作两步走的。他走了进来,饭早已开过了。

所以,我们与友人定约会的时候,若说随便什么时间,早晨也好,晚上也好,反正我一天不出门,你何时来也可以,我们便说:“马宗融的时间吧?”

姚蓬子先生的砚台

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,不信你交到那里一份文稿,而三五日后

再亲自去索回，你就必定不说我扯谎了。

进到书屋，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屋的主人——姚蓬子先生。他不定在哪里藏着呢。他的被褥是稿子，他的枕头是稿子，他的桌上、椅上、窗台上……全是稿子。简单地说吧，他被稿子埋起来了。当你要稿子的时候，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。假如说尊稿是十张纸写的吧，书屋主人会由枕头底下翻出两张，由裤袋里掏出三张，书架里找出两张，窗子上揭下一张，还欠两张。你别忙，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，一点也不少。

单说蓬子先生的那块砚台，也足够惊人了！那是块无法形容的石砚。不圆不方，有许多角儿，有任何角度。有一点沿儿，豁口甚多，底子最奇，四周翘起，中间的一点凸出，如元宝之背，它会像陀螺似的在桌子乱转，还会一头高一头低地倾斜，如浪中之船。我老以为孙悟空就是由这块石头跳出去的！到磨墨的时候，它会由桌子这一端滚到那一端，而且响如快跑的马车。我每晚十时必就寝，而对门儿书屋的主人要办事办到天亮。从十时到天亮，他至少有十次，一次比一次响——到夜最静的时候，大概连南岸都感到一点震动。从我到白象街起，我没做过一个好梦，刚一入梦，砚台来了一阵雷雨，梦为之断。在夏天，砚一响，我就起来拿臭虫。冬天可就不好办，只好咳嗽几声，使之闻之。

现在，我已交给作家书屋一本书，等到出版，我必定破费几十元，送给书屋主人一块平底的，不出声的视台！

何容先生的戒烟

首先要声明：这里所说的烟是香烟，不是鸦片。

从武汉到重庆，我老同何容先生在一间屋子里，一直到前年八月间。在武汉的时候，我们都吸“大前门”或“使馆”牌；大小“英”似乎都不够味儿。到了重庆，小大“英”似乎变了质，越来越“够”味儿了，“前门”与“使馆”倒仿佛没了什么意思。慢慢的，“刀”牌与“哈德门”又变成我们的朋友，而与大小“英”，不管是谁的主动吧，好像冷淡得日悬一日，不久，“刀”牌与“哈德门”又与我们发生了意见，差不多要绝交的样子，何容先生就决心戒烟！

在他戒烟之前，我已声明过：“先上吊。后戒烟！”本来嘛，“弃妇抛雏”的流亡在外，吃不敢进大三元，喝么也不过是清一色（黄酒贵，只好吃点白干），女友不敢去交，男友一律是穷光蛋，住是二人一室，睡是臭

虫满床,再不吸两枝香烟,还活着干吗?可是,一看何容先生戒烟,我到底受了感动,既觉自己无勇,又钦佩他的伟大;所以,他在屋里,我几乎不敢动手取烟,以免动摇他的坚决!何容先生那天睡了十六个钟头,一枝烟没吸!醒来,已是黄昏,他便独自走出去。我没敢陪他出去,怕不留神递给他一枝烟,破了戒!掌灯之后,他回来了,满面红光,含着笑,从口袋中掏出一包土产卷烟来。“你尝尝这个,”他客气地让我,“才一个铜板一枝!有这个,似乎就不必戒烟了!没有必要!”把烟接过来,我没敢说什么,怕伤了他的尊严。面对面的,把烟燃上,我俩细细地欣赏。头一口就惊人,冒的是黄烟,我以为他误把爆竹买来了!听了一会儿,还好,并没有爆炸,就放胆继续地吸。吸了不到四五口,我看见蚊子都争着向外边飞,我很高兴。既吸烟,又驱蚊,太可贵了!再吸几口之后,墙上又发现了臭虫,大概也要搬家,我更高兴了!吸到了半支,何容先生与我也跑出去了,他低声地说:“看样子,还得戒烟!”何容先生二次戒烟,有半天之久。当天的下午,他买来了烟斗与烟叶。“几毛钱的烟叶,够吃三四天的,何必一定戒烟呢!”他说。吸了几天的烟斗,他发现了:

(一)不便携带。

(二)不用力,抽不到:用力,烟油射在舌头上。

(三)费洋火。

(四)须天天收拾,麻烦!有此四弊,他就戒烟斗,而又吸上香烟了。“始作卷烟者。其无后乎!”他说。

最近两年,何容先生不知戒了多少次烟了,而指头上始终是黄的。

忆西谛先生

吴晗

西谛先生离开我们三周年了，他那天真的面容，爽朗的笑声，历历如在目前。

我和他相识快三十年了，三十年前，我还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念书，他是燕京大学文学系教授，在清华兼两点钟课，我听了他的课，从此便相识了。

西谛先生那时候已经出版了他所著的文学史，和鲁迅先生合作摘笈谱，名气很大。但是，他从来没有架子，既没有我们清华某些镀过金的洋教授威风，也没有那时候社会上有些自命为大学者的不可一世的神气。他和蔼可亲，谈话时总是笑，特别对青年人，只要有一长可取的，便加意鼓励，总是说“好极了！好得不得了！”这两句话，后来竟成为他的口头禅。在他逝世前不久，在缅甸国庆的酒会上，他、夏衍同志和我几个人在一起谈话。因为前些日子我发表了《变烟草》一文，夏衍同志也发表了谈花草果木的文章，谈话自然地集中在这个方面，西谛先生在谈话中又接连地说：“好极了！好得不得了！”我们还故意和他开玩笑。谁知道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最后一次谈话呢！

我是他的学生，可是他从不以老师自居，而以志同道合的朋友待我。

1933年秋天，西谛先生创办《文学季刊》，约了几个人做编辑，我记得其中有巴金、冰心、朱自清等人，我那时才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，因为经常在《清华周刊》、《清华学报》、《燕京学报》写些文章，也把我约上了，大家一谈，都很赞成，刊物便办起来了。我在创刊号上发表的《〈金瓶梅〉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》，他也夸奖说：“好极了！好极了！”相反，清华的有些教授看了，却不大以为然。有一个老教授曾对我说：“你研究《金瓶梅》，讲清时代也就算了，何必讲时代背景呢？”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，话里有话，原来那个时代是不许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，不但不许讲，连时代背景这类也是忌讳的，这是一个鲜明的对照。

我是个穷学生，无事不进城，有事进城，也上不起饭馆吃饭。有一次

进城，办完事，等回校的公共汽车，在东安市场旧书摊徘徊，忽然碰见西谛先生，他也在买旧书，一见面便问：“吃饭了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他就请我到五芳斋吃饭，记得这次吃了鲥鱼，是生平第一次。两人边吃边谈，天南海北，谈得没个边。从此便越发熟了，见面无所不谈了。

过了几个月，西谛先生离开燕京，到上海去了。1937年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，卢沟桥事变，占领北平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，在云南昆明开学。我先在云南大学当教授，后来又回到清华，长住昆明，和西谛先生的来往便中断了。

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攻，蒋介石政府连战连败，对敌屈辱，一味退让，对内却磨刀霍霍，掀起几次反共高潮，和全国人民为敌的丑恶面目逐步暴露的时候，我们在昆明创办了《民主周刊》，西谛先生在上海也创办了《民主》。道路相隔几千里，却不约而同，在两个地方同时办了反蒋介石、呼吁民主、要求和平的刊物，我和西谛先生虽然没有通信，这两个刊物却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。

1946年，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，西南联合大学解散了，三校师生都复员北上，我也取道上海回到北平。一到上海，首先去拜访西谛先生，一见面高兴极了，除了叙述日伪统治上海时期，他的困难遭遇以外，还谈了当前的工作。他说《民主》不准备再办下去了。要取得民主，实现和平，得采用另外一个方式。他已经参加了民主促进会，要进行长期的斗争。此外，在学术工作方面，他正在编辑《中国历史参考图谱》，几十年来搜集了不少资料，要做一个初步总结，便利研究历史的人们。他的书房里，书都让了位了，一格格摆满古代陶俑，主要是唐代的陶俑，有几个特别精美的三彩陶俑。他又指着连声说：“好极了，好得不得了！”为了购买这些陶俑和必要的资料，他欠了不少债。在编辑过程中，他自己奔走，请人照相，自己动手剪贴资料，写说明，一个人单干，他说：“这是手工业方式，可是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说了又笑了，接着又谈到在抗战前，他曾特地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访问了傅斯年，要求看一看殷墟和其他考古资料，谁知道竟被一口拒绝，不能看，“你看，发掘经过多少年了，自己不研究，也不许人家研究，不止是资本垄断了，连学术也垄断了。这就是国民党！不如此又怎么叫国民党呢？”说时很气愤，说完，他又笑了，接着说：“总有这一天，这些被长期封存在库房里的资料会重见天日的，会有这一天！”我说：“是的，不要很久，会有这一天。”

也正在这时候，国民党通过美帝国主义的帮助，用美国飞机、美国军

舰运输国民党军队，源源北上，准备大举进攻解放区。和军事进攻相配合的是政治恐怖，7月11日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，接着在15日又暗杀了闻一多。形势很紧张，我在上海，和同志们一道，参加了反蒋、反内战的斗争，到同济大学、大同大学、中教联，小教联做报告，欢送到南京请愿的代表和游行，西谛先生再三告诉我：“要警惕啊，提防有尾巴！”并且详细描述了自己上海多年来和特务斗争的经验，他对这些人，也有一句口头禅，那就是：“坏极了！可恶极了！”西谛先生的爱和憎是非常分明的。

1948年8月间，我又到上海来了。原来准备第二天就乘飞机到香港，和在香港的朋友们一道进入解放区，不料当天报纸登载了到香港买飞机票得凭相片的消息，香港是去不成了。当天晚上西谛先生就来看我，并立刻用电话通知一些朋友，一起在一个朋友家吃晚饭，商量办法。这次我在上海停留了个把月，他谆谆告诫，行踪一定要严守秘密，切不可在公开场合露面。有一次，他陪我买一支自来水笔，铺子里问要不要刻名字，我说要，提笔刚写了“吴”字上半的“口”字，西谛先生立刻抢笔过去，代我写了“辰伯”二字，还白了我一眼，意思是怪我太粗心了。

他知道我在等待机会进入解放区，又不能出来活动，十分无聊，就把他编辑的《玄览堂丛书二集》和《明季史料丛书》送给我，要我宁可在家读书，不可出门。通过他，叶圣陶先生、周予同先生、王伯祥先生还陪我逛了一趟苏州。

1949年初，北平解放了，我回到了北平。不久，西谛先生也到北平来了。久别后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。我们同住在北京饭店。有一天晚上，大家谈得高兴，一瓶酒喝完了，又到外面买了十斤酒，统统喝光。

此后，见面的机会多了，谈天，访古，买旧书，经常在一起。有一次，为了寻找明景泰帝的坟墓，我们两人在西郊南郊找了一天，后来毕竟在颐和园附近找到了，重新修缮，建为公园。记得有一次一起到琉璃厂，赵万里先生也同去，看到一本好书，赵先生要替北京图书馆买，西谛先生也抢着买，结果还是被西谛先生买了。他对旧书是有选择的，第一要插图本，第二是有关戏曲的，第三是小说，只要有他所没有的，便千方百计想法买，价钱贵一些也不在乎，以此，不少爱买旧书的朋友们，对他颇有些意见。他也知道朋友们有意见，笑着对我说：“这有什么关系，以后还不是国家的。”果然，他逝世以后，全部藏书一万五千多种都归了北京图书馆。

他藏书之多，我是知道的，这些年来，他收到一些好本子，也经常找

我欣赏。但是，他住的地方并不宽敞，除书架上的书以外，大部分都装在箱子里，并且还有一部分寄存在上海。最近读了他的《西谛书目》共27册，没有分类，是找人按撰书的地方和书籍藏书编列的，题签《西谛书目》是他的亲笔，中间也有个别地方经他改动。细读之后，才知道他的兴趣很广。藏书中主要类别有戏剧、小说、画谱、宝卷、弹词、考古、金石、文集、诗集、词集、目录、方志、丛书等等，而以戏剧、小说、插图本书为最精。除此而外，他也注意社会经济史料，例如抄本的《光绪十九年嵊县保甲烟户丁口册》、《贵阳府属道里册》《都匀府亲辖村寨道里册》、《平越府属、梨平府属物料价值》和刊本的《北新关商税则例》、《闽海关常规例》、《同治十年广和号刊丸散膏丹集录》等等。这一万五千多种书，是他一生节衣缩食，四处搜访，集一生精力得来的。他为国积累了这笔财富，对国家对人民做出了贡献。

三年前，在缅甸使馆酒会之后，知道他出国去了，也和往常一样，以为不久可以回来。谁知不多几天后，在北京车站上，碰见夏衍同志，他容色惨白，低声对我说：“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振铎死了。”我简直是晴天霹雳，一时被这消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第二天见报，才知道飞机失事的详情。三十年的老师和朋友，就此永别了！经常在学术上和政治上关心我、鼓励我的同志，就此永别了！

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，也参加了送葬行列，送到墓地，眼看他骨灰下葬。但是，纪念文字总是写不出来。因为一提笔就难过，就流泪，写不下去。这么一个体格健壮，永远乐观，生龙活虎般的人，怎么能忍心写他死去呢？三年了，我没有写文章。

我每一次进历史博物馆，总是想到西谛先生，他要活着，该是如何喜悦。

我每一次参观革命博物馆、军事博物馆，也不由不想到西谛先生，他要活着，该是如何喜悦。

同样，我每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收藏家捐献给国家名贵图书和器物的消息，也不由自主地想到西谛先生，他要活着，该是如何喜悦。

西谛先生，你的藏书已经成为全民的财产了。你的未竟的事业，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继承着。我想，你要是知道了，也还会说“好极了！好得不得了”的。我们就此告慰你在天之灵吧！

郑振铎先生的“书癖”

许觉民

振铎先生对中国古文学的造诣和文物知识的渊博素为人知，此外他于重印古籍设计的精细功夫也独有一番创造的心思。《西谛书话》中有《谈印书》一文，专门说了不少对重印古籍独有的见解。不过倘不经过和他亲自交往，他的那种处事方法之严谨与精到的工力就不会有深切的印象。1953年世界文化名人纪念，提名中有中国的屈原，这就要迅速将《楚辞集注》这部古籍赶印出来。出版社商之于振铎先生，他毫不犹豫地力主要将这部书印线装本，并提出还应印线装本《楚辞图》。关于印图谱的事，他一向认为除书之外，也要重视图。《西谛书话》中有云：古人“素不重视图谱，后世艺文之目，自隋唐以下，递相因习，故古人之图，日益亡佚而无纪。”这是他最感到惋惜的。他的插图本《中国文学史》，有文有图，可谓别树一帜。文学史著作中有了插图，固属罕见，其实适足以帮助读者增加文学史实的印象。那一次印《楚辞集注》和《楚辞图》，出版社原拟一般的照相影印，振铎先生以为不妥，力主非用珂罗版印刷不可。出版社悉从他所议，他于是亲自向北京图书馆商调二书的善本。北京因无印珂罗版之设备，他又写介绍信由出版社到上海去印制。出版社派了我和文怀沙先生两人去上海督印监制。两部书印得古雅，书函端庄。又商请沈尹默先生为两书题写书名，由此益见其清奇夺目。这两部书于1959年均得莱比锡书展的金质奖章。

由此次的印书，使我想起抗日战争结束后，振铎先生在上海亲自督印《中国历史参考图谱》、《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》诸要籍，这是他多年蒐集所得而编成的两部图像，印数无多，以后就未见再印，向隅者未能购得，至今有人说起，犹引为憾事。

至于振铎先生藏书之丰，尤其是古版珍本线装书，是藏书家中所罕有的。他对书之癖好，嗜之如命。为寻觅他所向往已久而不可得的书，真似思之心切，如摧心肝，一旦有了消息，往往寝食俱废，非得之而不罢休。

他在《蛰居散记》一书中曾提到在“孤岛”困居期间，为寻求旧山楼所藏元杂剧的经过，“耿耿不忘于心，念念不忘于口，见人必问，每谈元剧，必及此书”。虽然最后经过种种周折和困难终于侥幸购得了此书，欣喜地将之捧了回来，然而得之时几乎被人抢先，千钧一发，机会稍纵即逝，可谓幸运矣。

1951年，他为抢救可能失落于海外的一批古籍善本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。当时他得悉宝礼堂主人潘明训先生的藏书的情况，在战争期间，潘家家属生怕战争的影响可能造成藏书散失，遂秘密迁藏于香港，这消息外人是不得而知的。振铎先生于1951年听到这消息，十分忧虑这批善本流向海外，他知道内中有宋版善本一百一十部，元版善本六部，此项国宝倘若流失于他国，损失将难以挽回。不久后又得悉美国人愿出五十万美元收购这批书，这一回非同小可，如真被收购，要想追回是万难了。振铎先生迅即与香港潘家联系，难得的是潘明训的后代潘世兹先生深明大义，给振铎先生写来了一信，表明决不售与美国人，愿将藏书无偿地献给祖国。振铎先生获悉后惊喜交集，立即复信勉励，并报告周恩来总理，接着立即办理这批藏书运回北京的事宜，运回后归北京图书馆珍藏。

振铎先生自幼家境清寒，成人后或教书或当编辑，同时靠写作收入维持生活。他自青年时起，就嗜书如命，尤对古籍中的小说、戏曲、弹词、宝卷、版画等方面的好版本，倘有发现，不惜倾其囊而得之。他在《永在的温情》一文中自况：“我所藏的书都是很辛苦地设法购得的；购书的钱，都是中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减衣缩食的所余。一部部书都可看出自己夏日的汗，冬夜的凄栗，有红丝的睡眼，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手臂。”此中辛劳，道出了一个学者在困苦中生发出来的对书籍爱好的一片至诚至情。他的藏书，虽为自己研究之用，但到底也是为了保存而留给后世之用，最终这批藏书也全部捐献给了国家。

振铎先生不独爱书，他编书也有自己的独创性，30年代他主编《世界文库》，每册收有中外文学名著十余种，采取的是分章连载之法，每册可看到作品之若干章，续文则在下册连续刊出时再见，几乎是用杂志形式刊出的文章，共刊行了十二巨册，倘排列在一起，俨然是一大部皇皇巨帙，蔚为大观。凡持有全书的，数十种中外文学名著尽在握中矣。

不过他的爱书之心也有过挫折，那就是在“孤岛”时期，为生计所迫，他平素既无积蓄又无进益，一家数口要生活，不得已只有卖书之一途。他的家人在叙述他卖书前的情景十分凄楚：“……每逢卖书的前夜，